

---

#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 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刘 兵

---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周佛海等人由重庆出逃河内,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诱降声明,发表“和平建议”,公开背弃国民政府,以后又与日本签订“密约”出卖中国利权,至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彻底走到了民族敌人的立场上。汪精卫出逃及其后建立伪国民政府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大变故,由于汪伪所作所为并非中国抗战的主旋律,且其政权汉奸傀儡性质也无庸置疑,这一课题成为海峡两岸的治史者不愿多费笔墨,但又不得不涉及的一节。但是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以及多半个世纪后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这一课题却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今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北京怀柔举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主办、台湾《近代中国》杂志社协办、美国黄兴基金会赞助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与汪伪政权座谈会”,海峡两岸共有3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海峡两岸史学界对汪精卫及其伪政权进行的首次专门座谈会。

在会上,有几个议题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点,其中包括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的成因,对汪精卫等人发起的“和平运动”的评价,汪伪政权的性质等。其他诸如汪伪政府人事结构、汪伪政权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等问题,与会者也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 一 关于汪精卫叛逃的原因。

在目前大陆的研究成果中,汪精卫叛逃原因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所编写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总结的已经相当明确：汪精卫集团投日是因为“一、他们的民族失败主义恶性发展，他们完全为日本侵略者的暂时胜利吓破了胆；二、汪与蒋争夺权利的矛盾以及在‘和’‘战’问题上的政策分歧日趋尖锐，汪急于另谋出路；三、日本的诱降目标日趋集中于汪精卫集团，汪等也从半推半就发展到积极卖身”。这一结论基本代表了大陆学者的多数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有学者对汪精卫投敌的成因也提出独到的见解。台湾学者蒋永敬在他的论文《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中首先追述了汪氏“恐共”及其与之相关联制定对日政策的历史，认为1935年后汪致力于中日德意建立联合“防共”阵线。在抗战爆发后“汪认为中国只能被动作战而不能自动言和。中受了共产党的‘抗战到底’的口号所害”。显然，作者在这里强调了汪氏的“恐共”与其“投日”的关联，并引用蒋介石的话，“实犯了‘恐日’、‘恐共’之病”。作者最后还指出在国民党内患“恐共”病的人还大有人在，只是没有和汪精卫一道出走，并举国民党在嗣后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来说明“显为纾解内部‘恐共’心理，出于自救”的需要”。作者很注意研究汪氏投日动机的一个侧面，对于传统的汪氏出逃动因可以算是一种补充。来自台湾的另一位学者林能士则从研究方法上对汪氏出逃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发言是以标题为《谈谈运用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研究汪精卫》的论文为中心展开的。他指出借助心理分析研究人格形成或心理变化对历史人物的影响，一般而言有三个方面：“一是寻找潜意识对个体行为的作用；二是从当事人过去的生活历史，了解其行为模式；三是从情欲和情绪等方面，考察其行为动机。”他列举了两海外学者李国祁和王克文的文章来说明心理史学的研究成果，其中李国祁的观点是：“汪一生反覆不定的多变作风，与其性格不够稳定，一切但凭感情用事有密切关系。而隐藏在感情用事的背后，则是汪喜出风头不甘居人之下的得宠幼子性格使然。”王克文的观点则是：“汪之所以另立政权，与他勇于牺牲的浪漫性格有相当关系……从汪精卫本身的角度来说，则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由此

可突显他愿意放弃个人的事业与名声,来完成某种他认为对国家有贡献的目的。”这种观点本身虽不是林能士本人的观点,但他显然对利用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予以肯定。他自己也说“他们的论述是否得当,当然有待公评,但他们尝试从汪的性格分析其行事动机与作为,则值得肯定”。

大陆学者对汪的出逃原因除前述观点外,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北京师范大学的蔡德金虽然因病没有到会,但仍在病榻上整理出了题为《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的发言提纲,并请人在座谈会上代读。他说,他对蒋汪的分歧及汪精卫逃脱的问题以前的看法片面简单,认为在于“和”与“战”这两种对立主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正如邵铭煌先生所说,和平并非汪精卫的专利”。他们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与日本实现和平,而在于如何实现和平”。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这是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最低条件……”但是汪精卫的“条件”已经超过了这个最低限度,汪氏认为“如果抵抗唯有牺牲,其结果就是抗战只能使国家灭亡。与其抗战亡国还不如与日本实现无条件的和平”。蔡德金的观点从蒋汪分歧的角度对大陆学者的观点作了很好的注解,即分析汪精卫的出逃成因,不能从汪个人的角度,而应从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去审视。

## 二 关于如何评价汪集团的“和平运动”

从一般的概念来说,“和平运动”是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集团希望运用“和平”手段与日本达成妥协,停止中日间的大规模战争。“和平运动”由汪精卫集团中的部分成员和一些期望与日本实现“和平”的人结成的“低调俱乐部”发轫,运动以汪精卫出逃河内而至成立伪国民政府为一大成果,且一直被汪和其追随者运作至伪政府垮台。在会有学者提出对“和平运动”的性质不能一言以蔽之。

台湾学者胡春惠在他的发言提纲中分析了汪精卫“坐和”思想的转变,认为中日之间实力差距太大,且中国内部派系“各怀鬼胎,

根本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把握”，是汪倡导“和平”的主要时代背景。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对外主战的多半被捧为英雄，而主和的却常遭被骂为媚外的汉奸甚至被骂为狗熊”。汪精卫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不幸不仅是在抗日情绪的高潮时代脱离了抗日阵营，与当时高昂的抗日民族主义的潮流相抗衡，而且也未熟读历史汲取教训。胡春惠在会上发言说：“我有一个观点还是要坚持，就是汪精卫在1938年以前的低调俱乐部时代，他的出发点还是爱国的，是一种和平的试探。直到1938年春天以后，他才开始把‘和平’运动与他的私心与欲念结合起来。”他还说，汪精卫是汉奸，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要他，不把他当做中国人看，就是我们民族的不肖子孙的话，最后我们还是要把他当我们民族的子孙，因此我们在批评他、骂他汉奸的同时，也应给他一点同情去了解他何以成为这个样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曾业英对最近一段时期海外学者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重新评价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具体对海外学者王克文发表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2期）一文作了评论。王文说汪政权的和平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和平的努力不应该被否定，甚至因此而被视为汉奸”。其理由是“如果我们不从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以及知道中国最后会胜利的后见之明来看，在抗战的过程当中，中日关系的确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因为以中国的角度来说，如果太平洋战争没有发生，显然抗战的前景并不乐观”。曾业英在自己的文章中反驳了王的观点，他指出：我们讨论历史问题的绝对要求是从事实出发，王文“如果太平洋战争没有发生”的立足点是空的，没有讨论的基础。“抗战时期，中日两国相争，各有自己的民族主义，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日本的民族主义。同样，和平也有中国所需要的和平和日本所需要的和平之分……不从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来看’云云，岂不是要我们从日本本位的民族主义看问题？认同日本本位的民族主义的和平？难道这样的和平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肯定的吗？”他在文章的最后说：“战争也罢，和平也罢，除取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

因素,就是民众的诉求的制约,并不是哪个人说战就能战,说和就能和的。”

与会学者就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台湾学者邵明煌指出:在全面抗战初期汪精卫曾发表了许多言论,大陆学者往往引用两三篇他的讲话中的言论就来论定他是卖国的汉奸,这并不是—种很公正忠实的、学术的论述。他说,他个人曾粗略地读了一遍汪在抗战初期各种场合的讲话,认为从他在1938年10月底广州武汉沦陷前的言论来看,看得出来他就要卖国、作汉奸。当然言论也不能完全表现他的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同新指出:“和平运动”与“投敌”应区别看待。汪精卫叛国投敌并不是那一天就决定了,这有一个很长的思想过程。任何人思维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条件的许可,违背了当时民族的要求,就导致了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抗战爆发后,至从重庆出走,汪认为这是和平运动的一部分,但这个时候的和平运动已经不适应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日本对中国已经是步步进逼,全面侵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扬天石说:对汪伪集团的研究要深入进行。最近对汪伪的研究有偏差,在香港、台湾、日本和欧美有言论,认为汪精卫不是汉奸。我个人不赞成这种言论。抗战时期当汉奸的人虽有各样的理由,却都说自己是为了“救国”,但中国有句古话叫“立身一败,万事瓦砾”,这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和气节观,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 三 汪伪政权性质问题。

与会学者对汪精卫政权的性质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汪伪国民政府是日本武力下的傀儡政权。学者们从经济政策、鸦片毒化政策及与日本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提交的论文有上海复旦大学黄美真的《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的物资统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士花的《从汪伪政权的金融机构及金融政策看其傀儡性》、上海市档案馆陈正卿的《本华中“毒化政策”和汪伪政权》、南京大学朱宝琴的《汪精卫和大东亚会议》等数篇。

另有学者对近来海外一些认为汪伪政权“不完全是傀儡政权”的说法进行了评论。针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局面变成了一个

三头马车，一个是汪政权，一个是重庆政权，一个是延安政权，三方面彼此运用来与日本作战，合纵连横，使得战局显得非常微妙”，“因为汪政权的出现对日本来说，有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这样的说法，曾业英在文章中指出，这种说法没有事实根据，是一种“抽象推论”。他认为抗战时期日中之间首先是一个侵略与被侵略的双边对立关系，先是国、共联合对日双边对立关系，后来出了个汪伪政权，演变成国、共联合对日、汪联合的双边对立关系，这是最主要的关系，其他任何关系都是次要的，都必须服从这一关系，都受这一关系的制约。‘重庆政权、延安政权彼此运用来与日作战是存在的，因为它们同处抗日阵营，但汪伪政权能与其他任何一方彼此运用来与日本作战’吗？有这样的事例吗？”

蔡德金在他的发言提纲中谈到汪伪政权的性质时也指出，有人对他讲：“抗战时沦陷区的上海还是很安定的，经济发达。”似乎据此就应该对汪政权加以肯定。蔡说，持此意见者“对沦陷区的情况一无所知”，当时的经济繁荣有多种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重庆国民政府始终保持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维持法币和外币的比价”。而且实际情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占领区实行了残酷的物资掠夺，从此上海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江苏的苏常太地区盛产粳米，日军通过汪伪政权，将22个县的粳米定为军粮，中国人民只能吃粳米，米粮不能自由运输。北平和天津，老百姓吃的是混合面，还是定量供应。

#### 四 其他问题。

学者们在围绕上述问题热烈讨论的同时，也对汪伪政权相关的问题作了一些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其中杨天石提交了《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邵铭煌提交了《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以吴开先案为例》，前文通过对何、陈、陆三人在抗战中的身份变化和行为的追踪，力图说明现在对汪伪政权的许多方面还应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而后的主旨正象文中所指出的，“沦陷区的地下抗争，则有如一处暗角，久不为人所注意”。冀望更多人延伸触角，探索地下斗争层面，推

动汪政权研究趋于多面向，以建构史实全貌”。

台湾学者张力在《汪伪前期海军人事分析》一文中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对汪伪海军人员出身背景作了研究，指出：“他们大多数是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即已选择其立场。”一些人在请求汪伪海军收录时不免有些“和运日展、百废俱兴”、“献身海军、力图报效”等字句，同样也有人“不讳言为生活所困，愿意贡献所长，换取一家温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汪朝光的《抗战时期伪政权高官出身背景的统计学分析》一文是对各伪政权官员的人事研究，经过统计分析他得出若干结论，其中有：这些高官“留日比例较高……也显示出留学教育经历与个人的政治态度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伪政权高官中尚无黄埔军校出身者，真正属于与蒋介石有个人亲密关系或国民党主流派者亦为罕见。表明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在抗战时期对其下属仍然具备相当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台湾学者许育铭把他在日本所见的有关汪政权的研究状况结成一文在会上作了发言，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日本学者对汪伪政权的观点。

会上的发言及论文，此处不再一一赘述。时过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抗战时期的汪精卫及其“和平运动”和汪伪政权，这个问题在今天能够再拿出来讨论，应该讲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的。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对汪精卫和汪伪政府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切忌简单化和表面化。大陆和台湾学者表示要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学术交流，其中也包括资料和档案的交流运用。

（作者刘兵，196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责任编辑：荣维木）